

当代音系学的基本性质、主要概念及其重要作用 ——北京语言大学马秋武教授访谈录

马秋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

谢晓琳

东北大学, 中国

莫永茹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

摘要

音系学是语音的语法研究, 现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史, 历经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结构主义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本文首先从音系学、语音学在语音教学中的作用谈起, 分析和说明音系学、语音学与语音教学之间的关系, 简要说明音系学与语音学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然后, 就两个不同阶段之间音系学理论的关系作出具体阐释, 指出 50 年代之后的生成音系学主要在哪些方面不同于 50 年代之前的结构主义音位学, 明确界定生成音系学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 进而指出汉语学界在音系研究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

音系学, 音位学, 语音学, 语音教学

被访者简介

马秋武(1963-), 男, 天津市人,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2002~2008 年间任南开大学三级教授、博导, 2008~2017 年间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同济特聘教授, 2017~2021 年间任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现任《韵律语法研究》主编之一, 《当代语言学》、《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刊物编委, 教育部翻译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和审核评估专家、第六届国际韵律大会主席、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五六届副会长、音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长,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创始理事长、曾任天津市语委委员、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天津市对外汉语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南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语言所副所长等职。

马秋武教授近年来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出版编译著 30 余部。其代表性成果有: 《优选论与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组构》(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优选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 月)、《音系与句法》(商务印书馆, 2022 年 6 月)、《“天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 tjnmqw@126.com

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优选论解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何为底层形式?》(《当代语言学》2024年第2期)等。马秋武教授长期从事外语专业教学,对当代音系学理论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有很深入的研究,其理论造诣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学界所称道。

谢晓琳:马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今天与我们讨论音系学、语音学和语音教学的相关问题。能否请您先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可以。众所周知,音系学(phonology)是语言学的重要分支研究领域之一,是语音的语言学或语法研究。它所关注的是存在于表层语音背后的语法规则和规律问题。也就是说,音系学不是简单地从人们表面的发音事实说话的,而是从语音事实背后的支配因素来判断的。例如,在汉语普通话中,虽然我们把“伯伯”“弟弟”“哥哥”等中第二个音节的首辅音发成了浊塞音(即[b、d、g]),却从不承认汉语普通话中存在着浊塞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显然,这里面存在着语音与音系上的两种不同的观点:表层直接语音体现的语音观和内在系统的音系观。

判断语言里有没有某个音,不在于它曾否在这个语言里出现过,而在于它在这个语言里是否起着语法功能的作用。汉语普通话中没有浊塞音,是因为浊塞音在普通话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就像我们下象棋一样,棋子可以用任何材料制作,也可以把它制作得极为精细精美或简简单单,但无论如何,决定它身份的是它在棋中的功能与作用,而不是构成它的材料。音系学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传统的语音学研究。

音系学似乎很抽象,关注的也不是语音实体本身的构成问题,但实际的语言使用却无时无刻不受制于它。表面语言背后的语法属性,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与核心。索绪尔(Saussure 1916)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结构主义三大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布拉格功能学派和美国描写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音位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上贡献最大,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Nikolai Trubetzkoy)、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都是结构主义音位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为结构主义音位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结构主义音位学强调语音单位的对立性,认为音位是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例如,在汉语普通话中,塞音的清浊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而它们的送气与否则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送气的清塞音[p^h]、[t^h]、[k^h]与不送气的清塞音[p]、[t]、[k]构成了对立性的音位,如“铺[p^hù]”与“部[pù]”、“偷[t^hōu]”与“都[tōu]”、“壳[k^hé]”与“阁[ké]”。浊塞音在普通话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不具有音位地位,如“弟弟[tidi]”中的两个音节的首辅音。

结构主义音位学盛行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后被生成音系学所取代。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乔姆斯基和哈勒合著的《英语音系》(Chomsky and Halle 1968)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底层到表层的多步骤音系推导或映射理论,指出底层形式(underlying form)是一个只含有不可预测信息的形式,而表层形式(surface form)则是一个既有不可预测信息又有可预测信息的形式;表层形式中的所有可预测信息,都是通过音系规则的应用一步步添加上去的。也就是说,生成音系学将所有可预测的信息表述为一条条的音系改写规则,在音系推导或映射过程中应用这些规则,将可预测的信息添加到底层形式以及之后由它产生的一系列输入形式上,从而一步步推导出我们所需要的理想的表层形式。生成音系学的音系规则,实际上都是由一条条可预测信息转述而成的表达式。规则的应用是分先后的。哪条可预测的信息赋予底层形式,就意味着将负载那条可预测信息的规则应用于底层形式。

生成音系学是上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音位学之后的主流音系学理论,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是生成音系学的最新发展。无论是早期的结构主义音位学,还是后来的生成音系学,它

们都是语音的语法研究,与语音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注意:汉语学界所说的“语音学”与国际通用的“语音学”有很大的不同。汉语学界所说的“语音学”是广义的语音学,而国际上通用的“语音学”则是狭义的语音学。广义的语音学指的是“共时音系学+语音学”,而狭义的语音学则指的是纯语音的研究或语音的跨学科研究,它主要探讨语音的产生、传播和感知过程,主要分为三个研究领域:发音语音学(Articulatory Phonetics)、声学语音学(Acoustic Phonetics)和听觉语音学(Auditory Phonetics)。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声学和电子技术的进步,语音学在20世纪中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现代语音实验设备的开发与引用,使得语音学者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获得各种精确具体的语音数据,这对推动实验语音学在语音合成与识别技术中的应用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语音教学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发生在外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语音”不是英文的 phonetic,而是 pronunciation。如果把语音教学说成 phonetic teaching,那么就不是外语或对外汉语的语音教学,而是语言学专业下的语音学专业教学。语音教学与语音学教学有所不同,它并不关注语音学的理论知识,而关注的是学习者实际语言发音能力的培养,或外语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近来,就有学者在国内某个国际中文教育的期刊上公开发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论文,错误地把“语音教学”译成了 phonetic teaching。

莫永茹:马教授,您在《汉语学习》(2024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在语音教学前面加上了“动态”两字,是不是在有意强调“语音教学 pronunciation teaching”有别于“语音学教学 phonetic teaching”的这一特点?

是的,你说的没错。“动态语音教学”是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语音教学”前添加的一个术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可以说“动态语音教学”,但不可以把它直接译成英文的 dynamic pronunciation teaching。“动态语音教学”中的“动态”指的是如何教授(确切地说应该是“训练”)语流中语音的发音和听音技巧,相应的英文表达应该是 doing pronunciation。

在二语语音教学方面,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首先,语音教学不是语音的理论教学,绝不应该采取一种以教师讲授一个个单音发音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在这一点上,采用练中学、学中练的方式,让学生在语流中体会一个音的发音是最好的。举普通话四个声调的学习为例,我们的教学方法常常是让学生单独地读出四个调的发音:即“妈 [mā]”、“麻 [má]”、“马 [mǎ]”、“骂 [mà]”。当然,上声一定要求读成 214。可以想象,当学说“美国”这个由“上+阳”组成的词时,汉语初学者一定会把它说成“美⁽²⁾¹⁴国³⁵”,而不是正确的发音“美²¹国³⁵”。这就是因教学而产生的洋腔洋调发音问题。

其次,动态语音教学还在于让学习者可以尽可能地逐步走向实际语流的自然语音发音能力。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外语教学涉及听说读写四方面能力,四方面能力又可以划分为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听说能力是语言能力,读写能力是文字能力。大学四年外语专业所要解决的是高水平的听说能力和读写能力。如果要想达到高水平的外语能力,听说能力的培养一定是以动态语音教学为原则,有步骤、有层次、有目标地训练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所以,开设的课程不应该是孤立性的,而应该是成体系性、有规划、有层级、有目标的,如初、中、高级的听与说的课程,如影视听力、演讲、辩论等一系列的听说培训课程。

另外还要注意。一般的单音发音都是足音的发音,但语流中一般很少有足音的发音。所以,语音教学关注的重点不应该只放在单音的发音,更应该放在语流中的发音。这也正是我提出动态语音教学的意义所在。动态语音教学比一般语音教学难度更大,因为它没有单音教学时可以明确表述出来的那种静态的标准数据,如浊化到何种程度,音高提高到何种程度等。动态语音教学要求学习者在语流中体会每个音的实际发音,悟到每个音在轻重不同程度下的各自实际表现,认清同一个音在语流中不同位置上的不同表现。

总之，动态语音教学是语音的真实训练，重在培养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实践能力，而不是给语言学习者传授或灌输所学语言的语音理论知识。

谢晓琳：动态语音教学是您最近在《汉语学习》（2024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提出来的，动态语音教学与传统的语音学教学有很大的不同。您能否就动态语音教学方法再简要地谈一谈您的看法？

在实际语音教学中，动态语音教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关注学习者的语音背景、学习动机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语音学的内容进行教学。国内语音教学教材多是按照静态语音知识编写的。采用这种教材进行教学，其结果一定不会太好。所以，语音教学必须有创新。必须把动态语音训练而不是把传授语音知识作为语音教学的重中之重。其次，动态语音教学要强调发音的流利度而不是精准度。单音的准与不准，要在动态语音教学训练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能够自然、流利地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交流比达到完美精准的发音更为重要。二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语言学习者掌握外语的语言交流交际能力，而不是说得有多么的准确。最后，动态语音教学还要强调通过大量的语流中的实际操练，让学习者掌握语音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练习单音发得准与不准。

在语音教学上，国内外语教学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语音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准确发音。事实上，语音教学不仅在于纠正和培养发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音训练帮助学习者建立起所学语言的音系意识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和音系能力。音系学和语音学的理论指导是语音教学的基础，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在达到一定程度的发音训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语音教学的定位，努力把它与音系学、语音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做好外语或对外汉语的语音教学培养工作。

莫永茹：马教授，何为音系意识？它在语音教学中为何如此重要？

音系意识是学习者对语言语音结构的潜在意识。我们在二语语音学习时常常很快就能准确地学会一个音的发音，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却又很快忘掉了这个音的发音。原因何在？其实，我们的语音学习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初感触到的是音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把这个音置于自己所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语音学习称为“语音层面的语音学习”。但要想全面掌握这个音的发音，就必须把它有效地置于我们所学语言的音系之中，即拥有对这个音的音系意识和音系能力。我们知道，一个音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这个音本身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它在语言的语音系统中与其他音所构成的结构关系以及所具有的功能身份。所以说，产生音系意识、获得音系能力，才是学会发音的重要标志。我在2017年发表的“音系学、语音学与语音教学”一文中就曾对此做过具体的阐释与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那篇文章仔细地看一看。

获得音系意识和音系能力，不仅影响学习者的发音和听音能力，而且还对学习者未来的阅读和语言应用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培养学习者的音系意识和音系能力，实际上是帮助他们在脑海中构建语言的音系结构和体系，这对他们真正掌握所学语言至关重要。只有当学习者具备了音系意识和音系能力，他们才能灵活自如地调整和应用所学语言的发音技巧，从而在实际交流中做到准确、自然地进行语言交流。

语音教学所应追求的是建立音系意识、获得音系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解决发音的准与不准问题。一些英美人的发音可能并不是很“准”，但他们的日常交流没有问题。国内培养的一些学生，发音相当“标准”，却听不懂一些英美电影的对话，只有打出字幕，才发现其实是很简

单的句子,这些现象是非常常见的。动态语音教学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此。我反对只关注系统性地讲解语音知识的语音学教学,主要是它并不是给二语学习者开设的语音课程;给外语或对外汉语学习者所应开设的语音课程应是培养语言交际能力(能与人有效交流、交际)的语音课程。学习者在语音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要只停留在简单的语音模仿上,要尽早地建立所学语音的音系意识,全面获得所学语言的音系能力。

谢晓琳:马教授,您对语音教学中音系意识、音系能力的解释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动态语音教学的意义所在,也更加清楚为什么要把动态语音教学译为doing pronunciation。语音教学离不开音系学和语音学。长期以来,国内对音系学与语音学的关系有很多的误解,您能否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谈一谈您的看法?

首先,国内对语音学与音系学的关系有一定的误解。语音学主要是从生理、声学、感知等角度研究语音的,因此它不属于语言学的分支研究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就不把语音学作为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只把它作为语言学专业学生的选修课,但音系学则是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且音系学方面的课程还不只是一门导论性的课程,还有更多的音系学领域的研究性课程。

我在今年7月份举办的“首届当代音系学国际研讨会”上做了一场主旨报告,明确提出将音系学定义为“语音的语法研究”。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音系学与语音学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国内总是有学者错误地以为音系学是语音学的一部分。殊不知国际上普遍认为音系学不是语音学的分支,语音学也不是音系学的分支,但两者彼此紧密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结合,面对各个问题。语音学主要研究语音的物理性质,是跨学科性质的语音研究;而音系学主要研究语音的语法规则和规律,揭示语音背后的语法问题。其次,音系学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历经了前后两个重要理论的发展阶段: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结构主义音位学理论阶段和50年代之后的生成音系学理论阶段。

莫永茹:那么,您提到的这个“结构主义音位学”与“生成音系学”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二者的区别正是我下面所要说的内容,也是国内很多学者一直纠结不清的地方。结构主义音位学与生成音系学都是语音的语法研究,但它们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1) 基本单位不同: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基本单位是“音位(phoneme)”,虽然结构主义音位学家早已发现区别特征的存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音位不是最基本的音系单位的主张,他尽管注意到音位还可分解为更为基础的单位——区别特征,但仍认为没有任何与音系相关的单位比音位更基础、更重要的。但后来的生成音系学否定音位的存在,认为音系描写的基本单位是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①音位是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基本概念,而生成音系学中是没有音位的(Chomsky and Halle 1968:11)。但在我国,很多学者仍然认为我们的音系分析是离不开“音位”的,而且并不知道生成音系学理论中早已没有了音位这个概念。在没有音位的音系学中,汉语语音究竟怎么进行理论分析,仍然是困扰许多学者的一个难题。这可能也是现在汉语语音学界亟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②音系学是近年来常用的一个术语,而过去常用的“音位学”却用的越来越少。其实,这两个术语都译自英文的同一个词(phonology)。为什么我们以前把phonology译成“音位学”现在又把它译成“音系学”了呢?如果phonology用以指早先的结构主义音系学理论,那么把它译成“音位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指后来的生成音系学,那么就必须把它译成“音系学”,而不是“音位学”,因为后来的生成音系学中是没有“音位”的。

有学者喜欢把结构主义音位学改译成结构主义音系学，这当然没有问题，但音位学中有“音位对立”，并没有“音系对立”。将“音位学”改译成“音系学”似乎更新颖、更先进，但笔者认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所谈的是早期结构主义音位学的东西，那么为什么非要把它改译成“音系学”呢？这种改法实际上会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和误解。

2) 理论模式不同：结构主义音位学是以寻找和发现语言中的音位为目标的，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寻找最小对立对 (a minimal pair)。例如汉语里“铺 [p^hú]”与“部 [pú]”中的音节首就是一对最小对立对。结构主义音位学在方言调查、语音描写等方面简单易用，是方言学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但后来的生成音系学则完全不同，它不是以寻找和确立语言的音位为目的，而是以建立从底层形式到表层形式的音系推导或映射机制为目的。

显然，生成音系学意在建立语音的语法，它将语言中一切可预测的信息都变成了一条条的音系规则。在整个音系推导过程中，底层形式通过音系改写规则的应用一步步获得语言中所有可预测的信息，并最终变成既有可预测信息又有不可预测信息的表层语音形式。

谢晓琳：马教授，根据您刚说的，生成音系学确实完全不同于结构主义音位学。汉语学界现在主要采用的仍然是早期的结构主义音位学。我们还关注到，最近您在“当代语言学”（2024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何为底层形式”的文章，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底层形式”以及它在音系分析中的作用？

在生成音系学中，底层形式与表层形式是音系推导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即音系推导是底层音系形式开始的，经过一系列规则的应用，逐步推导出表层语音形式。这里，底层形式是我们所设定的一种没有任何可预测信息的形式。国内有学者把底层形式视为语言的音位，这是不对的。首先，音位是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基本概念，生成音系学中是没有音位的。其次，底层形式是设定的，它有可能是表层完全不存在的一种形式（如语境中和化、绝对中和化所产生的抽象的底层形式，表层就根本不存在），而音位则一定是表层存在的形式。另外，结构主义音位学是通过对立原则所产生的一种抽象的音系形式，而底层形式并不是通过对立原则产生的，而是通过运用各种语法原则综合分析得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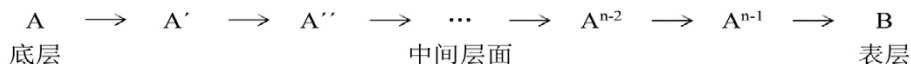
生成音系学的底层形式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底层形式，主要取决于其音系语法的构建情况。生成音系学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奥卡姆剃刀原则，即经济性原则。无论是底层形式的设定，还是音系推导或映射方式的选择，哪种方式最简洁、最有效则就是生成音系学研究所应选择对象。

注意：底层形式一定是去除了一切可预测信息之后的形式，它所具有的任何信息都已无法用规则或原则来表达，而那些可预测的信息均已被表述为一条条的音系规则或原则。生成音系学所要做的是从这个底层形式开始，通过一步步有序排列的规则应用将一切可预测的信息一步步赋予底层形式，从而推导出我们所希望获得的理想的表层形式。底层形式的设定、音系规则的表述以及规则的排列方式等，构成了生成音系学语音语法的主要内容。底层形式既是生成音系学音系推导或映射的起点，也是语音语法的关键所在。所以，正确理解什么是底层形式，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背后的深层规律，帮助我们解释不同语言中的音变现象。

莫永茹：您最近的一次报告的主题是“为什么说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其中，“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汉语学界的许多学者对此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现在，您能否就这个问题做一下更为详细的说明？

音位是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通过寻找最小对立对来识别音位,这在我们传统的语音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Chomsky and Halle (1968:11)明确提出有充分的理由质疑音位层面的存在。我近来撰写文章,介绍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的观点,结果遭到刊物的退稿,理由是刊物评审专家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SPE 否定音位层面的存在,但并没有否定音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专门在网上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为什么说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报告之后,反对否定音位存在的声音应该小了很多。

SPE 提出音位层面的存在没有得到充分证据的支持,注意这个层面的英文是 level。那么,什么是 level?生成音系学是一种音系推导或映射理论,它的音系推导或映射是从底层形式开始的。我们前面的分析都已做了充分说明,生成音系学的底层形式并不是结构主义音位学中的音位,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在生成音系学中,从底层开始的音系推导或映射是多步骤的,每一步的音系推导或映射都是通过规则将一种可预测的信息赋予每一次层面上的底层输入形式。也就是说,每条规则的应用就是将一种可预测信息赋予底层输入形式的过程,每次规则赋予信息后所产生的新的输出形式就是音系推导或映射中一个新的层面(level)上的形式。如果在整个音系推导或映射的过程中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音位层面,那么音位又怎么能够存在?生成音系学的整个音系推导或映射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这里,A是音系推导或映射的底层或起点形式,其后经过一系列的中间层面,即经过一系列规则应用所产生的中间形式,最终推导或映射出表层形式B。如果整个音系推导或映射过程中连一个音位层面都不存在,那么音位又该怎么能够存在呢?所以,SPE 否定音位层面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音位的存在。

汉语学界对此不能理解的原因,主要是现在还没有从传统结构主义音位学的分析方法中走出来,还没有真正理解当代音系学的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生成音系学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了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对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还含混不清,认识不到生成音系学在理论上的这一突破的重要意义。

莫永茹:不用生成音系学而用结构主义音位学研究汉语,那又怎么样?难道不好吗?

确实不好。结构主义音位学与生成音系学相比,它不仅有很多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而且在分析深度上也远不如生成音系学。例如,结构主义音位学是通过对立原则来寻找和确立音位的。通过寻找音位,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音或音位。例如,在汉语普通话中,清塞音的送气与否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具有音位价值([p^h]与[p]在普通话中是两个具有区别意义的音位)。但塞音的清浊却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不具有音位价值([p]与[b]在普通话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应该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形式)。音位是一种抽象的音系音类单位。一个音位通常都会有几个不同的实际体现形式,即音位变体(allophones)。音位变体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位置上,故而被称为“自由变体”,也可以不能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即凡A出现的位置,B一定不出现,二者处于互补分布之中。

结构主义音位学的这种分析是有问题的。首先,音位并不是都能通过寻找最小对立对找到的。如果找不到最小对立对,怎么办?其次,音位是区别意义的;man与men也是通过音位区别的,但区别的并不是意义,而是形态,故称形态音位。那么,形态音位与一般音位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另外,结构主义音位学只列出一个个的音位变体,但不能很好地说明变体之间的形式关系,这

也是很有问题的。由此可见,当结构主义音位学遇到其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时,就会造出类似“形态音位”这样的概念来解释,其实是掩饰了其理论上的根本缺陷。

生成音系学则不然,它关注音与音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说明音位变体之间的变化过程。举英语名词复数词缀为例。结构主义音位学采用的是列举法,即 {pl}={-z, -s, -iz}。但生成音系学首先确定三个复数词缀中哪个词缀是复数的底层形式,然后分析并构建相关的音系规则,确定音系规则的音系排序,通过从底层到表层的多步骤音系推导或映射,获得它的表层语音形式。生成音系学不仅能够建立起音与音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且还能清晰地呈现出语音的各种语法属性。

莫永茹: 马教授,您讲到,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但有音段,是不是把音位换成了“音段”?

生成音系学中没有音位,它的音系分析基本单位是区别特征。生成音系学中的“音段”不同于结构主义的音位,它只是一个单音的概念,并没有音位所具有的价值。换言之,音段只是一个单音的概念而已。具体地说,在 SPE 中,音段只是由一束区别特征构成的“特征矩阵 (feature matrix)”的简写形式。因此,一个音段语符列 (a string of segments),就是特征矩阵的线性序列组合。注意:这是生成音系学的早期经典理论模式,后来的生成音系学又有了很大变化。

总之,有几点需要注意:1) 无论是生成音系学的底层表达式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表层表达式,还是词库表达式,其基本单位都是区别特征。2) 在早期的经典理论阶段,区别特征都是偶值的,每个特征在整个音系的推导或映射过程中都是充分赋值的,即区别特征无论是在词库、底层还是在语音结构中均带有一个正 (+) 值或负 (-) 值。3) 生成音系学中还存在音系特征与语音特征之分。音系特征是一种类化的特征,其特征值分为“有” (+) 与“无” (-) 的关系;而语音特征则是一种量化的特征,即呈现特征的某种程度值,如完全鼻化、大部分鼻化、半鼻化和小部分鼻化等。不仅特征分为音系特征与语音特征,音段也分为音系音段 (phonological segment) 与语音音段 (phonetic segment)。4) 随着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底层的音段特征并不都是必须赋值的;有些特征不在底层赋值,有利于促进某些音系音变的发生。也就是说,某些特征底层赋值,某些特征不赋值,等到某些音系过程完成后才赋值。生成音系学的不充分赋值理论 (Underspecification Theory)(Archangeli 1984, 1988)、特征架构理论 (Feature Geometry Theory) 等后来的形成与发展,完全改变了所设定的音系底层音段的结构表征形式。

谢晓琳: 马教授,在谈到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音时,我们常常提到 phoneme inventory 或 segment inventory,这里不是用 segment 替代了 phoneme 吗?另外,生成音系学在确定一种语言的基本音位或音段数量上与结构主义音位学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非常想谈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音系学主要回答三个问题:① 音位数量 (phoneme inventory) 或音段数量 (segment inventory) 问题,即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音或音位?② 语音配列 (phonotactics) 问题,即哪些音可以与哪些音一同出现?③ 音系音变 (phonological change/alternation/event/process) 问题,即哪些音遇到哪些音会发生音系音变?你刚才提出的是这里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结构主义音位学在确定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音上已被我们广泛接受,那么生成音系学又是怎样确定底层音系音段数量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搞清楚底层音段形式与音位之间的异同。

首先,二者产生的方式不同。音位是结构主义音位学通过对立原则产生的,而底层音段形式是设立的,其设立是在充分考虑各方面语法原则或条件的情况下做出的。其次,音位一定是

表层可以找到的某个形式,但底层音段形式则有可能是表层根本就不存在的,完全是虚拟出来的。例如,长u音([u:])是为Yawelmani语设立的一个底层音段形式,但它从不出现在这个语言的表层形式中(即Kiparsky(1968, 1972)所称的“绝对中和化”的虚拟形式)。另外,在结构主义音位学中,音位通常都是一个个的单音,但在生成音系学的创建初期,音段已被音系表征为一个由若干个特征构成的特征矩阵。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特征架构理论和不充分赋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底层音系音段表达式越来越抽象,基本上就已变成了一个多音层的音系结构式。这一点,读者可以读一读王志洁所做的博士论文(Wang 1993)。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我们当然可以(采用结构主义音位分析方法来)确定一种语言到底有多少个音位,同样也可以(采用生成音系学的音系分析方法来)确定一种语言底层到底需要设立多少个音系音段以及需要设立哪些音系音段来完成这个语言的所有音系推导或映射过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分析比前者更深入、更系统、更具解释力。

谢晓琳:马教授,通过您的介绍和阐释,我们对生成音系学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最后,还想请您就我国的音系学研究现状做个简要的说明。

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音系学的主流理论地位。五六十年代占据我国音系学主流地位的,无疑是结构主义音位学。英文phonology这个词在那个时候也都一直译成“音位学”。改革开放初期,phonology也都被译成了音位学。随着我们对生成音系学的了解增多,知道生成音系学中没有了音位,80年代中后期,王嘉龄先生率先提出要把phonology这个术语译成“音系学”的主张。王先生的提议得到了广泛认可,音系学逐渐成为了语言学的一门独立的重要分支学科,甚至过去一直被称之为的结构主义音位学,也纷纷改称为结构主义音系学。把音位学改称为音系学当然没有问题,但把音系学改称为音位学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音位学只是音系学百余年的发展史的一个阶段而已。需要指出的是:把音位学改为音系学容易造成混乱,所以最好不改,除非需要用音系学统称前后两个阶段时才可以改。

生成音系学是结构主义音位学之后的音系学。近70年来,难道只有生成音系学的这一家音系学理论吗?这可能是国内很多学者常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当然,近70年来音系学有很多的理论。读者可以仔细翻看一下《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赵忠德、马秋武2011)一书,那里面列出了百余年来各种音系学的理论与流派。但这些理论中绝大多数都是生成音系学理论框架内的衍生理论,如依存音系学、管辖音系学等等。可以说,生成音系学之外就真的没有什么像样的有影响的音系学理论了。所以,结构主义音位学应该属于现代音系学的理论,而生成音系学则应属于当代音系学的理论;鉴于当代音系学主要说的就是生成音系学,因而本文的题目选定为“当代音系学的基本性质、主要概念及其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把生成音系学理论放到一旁不予理睬,而只关注70年前的音位学理论,这样的态度既跟不上国际音系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对推进汉语自身的语言学研究也是一种阻碍。我们汉语方言研究,特别是方言的语音研究若不采用生成音系学的最新方法,仍停留在结构主义音位学的研究阶段,肯定不可能有更加深入的汉语方言音系研究,尤其是不能准确揭示汉语方言音系类别差异的根本原因。

最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国内外音系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特别是汉语的音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争取为汉语音系研究做出贡献。

投稿:2024年10月9日;接受:2024年12月20日;出版:2024年12月24日

作者简介

谢晓琳，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系学专委会理事，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学术论文、书评、名家专访和业界评论。作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系列大赛活动的讲师及评委之一，谢晓琳还担任多家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曾任《中国日报》社 **China Daily** 和北京日报集团今日北京英文报《**Beijing Today**》记者编辑，报道《北京科技周》英文专刊，并参与翻译《世界 500 强的中国主张》和《忠诚的神话》。

莫永茹，在读博士生，现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生成音系学方向。

Contemporary Phonology: Fundamental Nature, Key Concepts and its Important Role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iuwu MA

Qiuwu M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

Patricia Xiaolin Xi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China

Yongru Mo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Phonology, the grammatical study of speech sounds, has gone through a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ver 100 yea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tructuralist phonemics and generative phonology. The interview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role of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in pronunciation teaching, analyz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ronunciation teaching with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and briefly outlining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phonology and phonetics. Then, a specific explanation will be give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stages of phonological theory, pointing out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tive phonology after the 1950s and structuralist phonology before the 1950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methods of generative phonology will be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 phon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language will be identified.

Keywords

Phonology, phonemics, phonetics, pronunciation teaching

Qiuwu Ma, a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nd head of Institute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at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He was a professor (T3) at Nankai University from 2002 to 2008, Dean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Tongji University from 2008 to 2017 and a professor (T2) of Fudan University from 2017 to 2021. Currently, he is co-editor-in-chief of *Studies in Prosodic Grammar*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so on. He was a member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session of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Education and an exper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Assessment of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worked as chair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ech Prosody*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5th and 6th session of the Society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He initiated and established th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a's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Phonology. He once served as the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ianj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Tianjin Associ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s a Foreign Language,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of Nankai Universit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t Nankai University.

Patricia Xiaolin Xie,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Phonolog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Society. She has published journal papers, book reviews, interviews with renowned figures, and industry commentar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s a lecturer and judge for the China Education Television's "Telling Good Story of China" projects, Patricia also serves as an editor and reviewer for multipl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Previously, she worked as a reporter and editor for China Daily and the Beijing Today English newspaper, covering the English edition of the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ek" and translating works such as "China's Proposals for the Fortune 500" and "Loyalty Myth".

Yongru Mo, PhD candidate at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majoring at generative phonology.